

易孟醇 著

曾国藩传

广西人民出版社

易孟醇 著

曾国藩传

广西人民出版社

曾国藩传

易孟、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湘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52.8千字 印数1—5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3084-3/F·317 定价 26.00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上溯到黄帝的家世	(10)
第一节 远祖	(11)
第二节 近亲	(15)
[附录] 曾氏世系表	(23)
第二章 并不平坦的求仕之路	(24)
第一节 肩负长辈的期望	(24)
第二节 “早售”之喜	(26)
第三节 又一个五年	(30)
第三章 “久虱”京官	(33)
第一节 七迁至侍郎	(33)
第二节 恪守终身的政治路线	(47)
第三节 一本棱角分明的奏章	(51)
第四节 幻灭了的补天之术	(57)
第五节 “文章说心章”	(64)
第四章 章压太平天国的前期活动	(73)
第一节 从墨经从戎的反对者到践履者	(73)
第二节 “曾剃头”的由来	(77)
第三节 愤走衡阳	(85)

第四节	志焉不小	(91)
第五节	两个书生，两篇檄文	(100)
第六节	初战的悲喜剧	(105)
第七节	署鄂抚七天	(114)
第八节	第二次投水自尽	(123)
第九节	窝囊的两年赣战	(128)
第五章	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活动	(140)
第一节	第二次墨经从戎	(140)
第二节	“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147)
第三节	拒绝西防东征北援之谜	(153)
第四节	祁门洞开后的迁怒	(167)
第五节	争夺安庆之役	(179)
第六节	对江浙的经营	(191)
第七节	顿兵金陵城下的重重矛盾	(202)
第八节	鲜血染红的顶子	(217)
第九节	大喜日子里的隐忧	(225)
第六章	从顶峰到低谷：攻捻中的政治下坡路	(238)
第一节	坐山观虎斗	(239)
第二节	曾僧攻捻方略之比较	(242)
第三节	快快回任两江	(252)
第四节	曾李的历史性瓜代	(264)
第七章	处理天津教案中的矛盾心态	(270)
第一节	“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270)
第二节	一切在逆反中	(274)
第三节	时代的悲剧人物	(283)
第八章	中国近代化的光辉先驱	(292)
第一节	地主阶级的积极自救者	(292)

第二节	“师夷长技”的可贵遵行者	(298)
第三节	经世之学的优秀发扬者	(312)
第九章	章后的岁月	(324)
第一节	第二次回任两江	(324)
第二节	治事不息，诲人不倦，学习不止	(330)
第十章	基本总结之一：政治上的礼治	(336)
第一节	以“礼教”为根本	(337)
第二节	以“仁刑”为手段	(342)
第三节	以“血诚”为保证	(351)
第四节	以“恕忍”为条件	(353)
第十一章	基本总结之二：军事上的变革	(361)
第一节	革绿营之弊，创湘勇之新	(361)
	一、从“改弦更张”到“别树一帜”	
	二、以强化封建意识作为建军原则	
	三、以地缘血缘为纽带	
	四、以严格的营制营规为束伍	
第二节	战略战术中的辩证因素	(377)
	一、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	
	二、通筹法：两利相形，当取其重	
	三、稳慎棋：以静制动，以主待客	
	四、多变术：虚实结合，正奇互用	
第十二章	基本总结之三：人才上的开拓	(395)
第一节	“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	(395)
第二节	广收慎用	(401)
第三节	勤教严绳	(410)
「附录」	幕府人物名录	(416)
第十三章	经学思想	(423)

第一节	没有理学著作的理学家	(423)
第二节	性命并提的天人观	(429)
第三节	格物穷理的心物观	(434)
第四节	主敬立诚的伦常观	(437)
第五节	折衷调和的学术观	(444)
第十四章	修身处世论诗论文及其他	(451)
第一节	治学篇	(452)
第二节	修身篇	(461)
第三节	处世篇	(479)
第四节	家教篇	(491)
第五节	文 论	(505)
第六节	诗 论	(529)
第七节	书法论	(540)
[附录]	曾国藩亲友同僚名录	(550)

引 子

凡长篇叙事文字，常有一篇开场白。我也不能脱俗，便从本书的主人公曾国藩之死写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戌刻，即公元1872年3月12日晚10时左右，在金陵总督府的后厅里，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赏戴双眼花翎、赏穿黄马褂、世袭一等毅勇侯曾国藩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清朝廷紧接于二月十二日，追赠曾国藩为太傅，赐文正。头衔一大堆，位至崇，官极高，入正揆席，出总师干，显极矣。对于这些头衔，人们钦羡不已，但死者本人在当年却另有一番体察。同治元年，曾国藩的头衔还没有这么多，还没有这么大，他却感到几分厌恶，在日记中写道：“公牍中所刻余官衔，字数太多，因赐去十四字，令其另刻。戏题一绝云：

官儿尽大有何荣？
字数太多看不清。
删去几条重刻过，
留将他日写铭旌。”①

① 《曾国藩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岳麓书社出版，《日记（二）》第716页。

果然，这些头衔都写在他的铭旌上，竖在他的灵前了。

曾国藩衰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忽有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回到内室，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大家劝他请假暂休，他说：“请假后，宁尚有销假时耶？”他向欧阳夫人问起父亲麟书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逝世时患病的情况，说：“吾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正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我反省道：

余患病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痲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暈、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虛之所致也。不能法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慙休何极①！

二月初一日，他又自省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②。

第二天，他正伏案批阅公牍，忽又发上月二十六日病症，手颤舌强。他自知来日无多，召来纪泽、纪鸿二子，费了很大精力，才勉强地说明白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心意：丧事应遵古礼，不要用僧

① 《全集·日记（三）》第1942页。

② 《全集·日记（三）》第1943页。

与道。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即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乃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①。

这位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六十二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

曾国藩的门下士四川人李鸿裔，字眉生，写了一付挽联道：

位冠百僚而劳谦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愚，不震不腾，
隐几独居勋业外；

年垂大耋而神观勿衰，病至弥留而袂掌靡思，如临如履，
易簧犹在战兢中。

写得确也实实在在，“易簧犹在战兢中”，尤是实情。

当然，对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深足印的曾国藩，人们并不会像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天所作的自我鉴定那样来鉴定他。

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精盟本”；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带”，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

① 曾国藩逝世前几天事，见曾纪泽《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第18页，岳麓书社版。

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曾广镛、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曾国藩生荣死哀，荫及子孙。

举丧后，他的灵柩停在总督府的正厅中，香火缭绕，祭幛满堂，每日吊唁者自朝至夕不绝，挽联、挽诗、祭文如雪片飞来，都非夸饰之辞。就中有以“安徽官民”名义写的挽联一首，道是：

相业匡时，武功定乱，经术名家，上下千古孰后起前，我公不朽；

九重震悼，百姓悲思，三军涕泣，东南半壁感恩怀德，吾皖尤深。

上联写曾国藩在文、武、经术三方面的成就，下联写官、民、军三方面的哀思，也都是实情。

时人如何评价这位刚刚陨落的巨星？这从挽联中可窥见一斑。他的受业门人梅启照写道：

武乡可拟，汾阳可拟，姚江亦可拟，潇湘衡岳，闻气独钟，四十年中外倾心，如此完人空想象；

相业无双，将略无双，经术又无双，蒋阜秦淮，巨星忽陨，廿六载门墙回首，代陈遗疏剧悲哀。

说曾国藩的“相业”、“将略”、“经术”在中国历史上“无双”，显然过分，把他的相才、将略与三国时的武乡侯诸葛孔明、唐代的宰相汾阳郡王郭子仪相比，把他的经术与明代姚江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相比，可看出他的同时人对他的评价之高。与梅启照的“无双”的夸饰相比，倒是曾国藩的老友彭玉麟写的挽联较为朴质面令人信服。联语道：

为国家整顿乾坤，耗完心血，只手挽狂澜，经师人师，我

侍希文廿载；

痛郟城蹂躏函丈，永诀温颜，鞠躬真尽瘁，将业相业，公是武乡一流。

清朝廷经康熙、雍正、乾隆的全盛时期，至道光、咸丰之际，气数已衰，外有侵略者的鸦片和大炮，内有起义者的檄文和刀矛，政治腐败，水旱频仍，哀鸿遍野，危机四伏。曾国藩为挽救大厦之将倾，确实“耗完心血”、“鞠躬尽瘁”。说他以范希文的箴言自励，先忧后乐，也并非虚言诳众。

凡比拟，两者之中必有相同相近之点。比曾国藩为武侯、汾阳，则他们有何者为相同相近？英翰的挽联写道：

福迈武乡侯，尽瘁鞠躬，百战卒成中兴业；

寿输郭尚父，内忧外患，九原犹系老臣心。

何绍基挽道：

武乡淡泊，汾阳朴忠，定于公元辅奇勋，旗常特炳二千载；

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怆忆戎词坦凯谊，风雨深谈四十年。

孔明鞠躬尽瘁，郭子仪于内忧外患之际，心系九原，曾国藩一生行事，实有相似之处。至于孔明的淡泊明志，郭子仪的质朴忠诚，曾国藩也差可与伍；然谓曾有司马迁、班固的史载，有苏轼、黄庭坚的诗名，则恐非所可及。曾国藩力挽桐城派古文之狂澜于既倒，在诗文方面均有时名，却终难逮班、马、苏、黄。比喻或比拟总是蹩脚的，无法维妙维肖，质言其事，直捷已意，有时更能树真象、恰心意。安徽知府刘奎光送去的挽联写道：

文能拊众，武能威敌，将相规模往古备；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圣贤学问近今稀。

还有淮军将领、官湖北提督的郭松林挽道：

伟业冠古今，满而不溢，高而不危，统求国计民生，先

忧后乐；

荐贤遍天下，功则归人，过则归己，若论感恩知己！并
口同悲。

两联各写了曾国藩功业德行的几个侧面，合起来却刻画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曾国藩死而有知，足可以慰藉九泉。

还有左宗棠，谦称“晚生”，所撰挽联，别有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他处于危厄之际，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以四品京堂充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位至督抚，终于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当时，曾国藩的门人僚属把这些挽联、挽诗、祭文、御制碑文以及郭嵩焘撰写的墓志铭，编为《曾文正公哀荣录》，虽皆歌功颂德之作，却不失为第一本曾国藩评论集。

曾奉曾国藩之命襄校于江南官书局的朱孔彰，于光绪二十三年刊版的《中兴将帅别传》（初名《咸丰以来将帅别传》），赫然列曾国藩于卷首。曾国藩被称为咸同“中兴”名臣的第一人，第一次载入了史册。

稍晚于曾国藩的张之洞、梁启超、袁世凯等人对他多方推崇，视为圭臬。梁启超更编《曾文正公嘉言钞》，分治身、治学、治家、治世、治政、治军等六部分，使曾国藩的言论得以广泛流传，影响递增。梁启超在这本《嘉言钞》的《序言》中甚至说：“曾文正公，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

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这种尽量夸饰的话，也确实存在一些正确的因素，即曾国藩能合学术与事功而为一，他的道德、人格常产生巨大的力量，“卒乃复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他概举说：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纯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铄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为使曾文正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①！

这些话，大体上是实事求是的。曾国藩虽是个因时而变的人，他能不能跟上时代，却谁也不能妄言，但他那种困知勉引的品质，实是一个成大事业的人所必需具备的。梁启超如此推崇与宣扬曾国藩，自然也出于他的维新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②

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军事家蔡松坡也极重视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认为他“一介书生，出身词林”，“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而竟“武功烂然，泽被海内，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名将相颉颃，而毫不逊色”^③。因辑成《曾胡治兵语录》行世。后来窃取了国家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对曾国藩更视若神明，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

① 《曾文正公嘉言选序》，见《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论私德》，《饮冰室文集》卷十二。

③ 《曾胡治兵语录·按语》。

语录白话解》，认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放置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可见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一度是康梁、信徒，故受曾国藩的影响也颇深。在探求世事的大本大源时，他也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联乎？”^① 可谓备极赞颂。然而1917年8月23日写这些话时的毛泽东，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话是他受儒学文化的影响的结果，是他的圣贤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映^②。从他后来对农民战争包括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与立场的彻底变化。他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求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③ 不管历史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曾国藩，但毛泽东年青时的话，无论如何不能作为他对曾国藩的定评。

曾国藩生前死后的一百多年中，贬抑和指摘他的人也不少。他在世时，便多次遭到御史们的弹劾，“清议者”的讥评，即如翁同龢和者，在日记中也对他多有微辞。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政见分歧，尚可以略而不论。至辛亥革命时期，以推翻满清政府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自然对中

① 《致黎锦熙》，《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如上述信中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天达地，明贯过去，预知未来，洞悉三界现象。”（第87页）又如《讲堂录》说：“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88页。

兴满清的曾国藩不会喜欢。语言学家俞樾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等文中极力推崇曾国藩，但他的弟子章太炎则一反老师之所为，在《检论》中极力贬斥曾国藩，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藏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孙中山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更明确地说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不肖子孙”。自《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刊出后，曾国藩更声名扫地。文章认为，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的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① 这话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说的。

及至近十馀年，历史研究更多了一点实事求是的学风以后，片面性才少了一点，于是拨开重重历史迷雾，重新认识曾国藩的本来面目，公正地分析他的历史功过，正确地理解和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已成为了人们的愿望和行动。历史评论，往往受着评论者的历史观、社会观以及当时的政治斗争的需要等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然而，历史事实终归永远是客观的存在，“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②。

①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08～409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9页。

第一章 上溯到黃帝的家世

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夜半,一个小生命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

湘乡设县它很久远。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五月,长沙王之子昌被封为湘乡侯^①,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湘乡”二字。至东汉,分湘南县地正式设立湘乡县,属零陵郡。隋撤销湘乡县制,其辖境改归衡山县。唐武德四年(621)复置^②,元升为州,明复为县,明清时属长沙府。湘乡县地处湖南腹地,为典型的丘陵地带,以农耕为主,地瘠民贫。诞生小生命的那个偏僻而闭塞的小村,距县城约一百二十里,属湘乡县第二十四都,与衡阳县毗邻,有山曰高嵛山,地名大界,村名白杨坪,屋场名萧家大屋(后改名为白玉堂)。1952年9月,人民政府析出湘乡西南地区的第三、第六、第七区,另设立双峰县。白杨坪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天坪村。

这个呱呱堕地的小生命,就是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度叱咤风云、影响中国历史进程,被清代称为“中兴”大臣的曾国藩。

^① 见《汉书·王子侯表》下。

^② 见《元和郡县志·江南道》